

附錄 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

陳澤民



(編者按：本文為中國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陳澤民教授於滿地可「中國教會」國際會議上之講詞，因本期本刊發表劉賽眉修女一篇對該演講所作之神學反省，故附錄原文，以供對照參考。)

一九五〇年以前，中國基督教沒有創造出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神學。在一個半世紀間，所謂「中國教會」，只不過是一些西方傳教組織的派出機構，不過是傳教活動地圖上的一些點點而已。雖然有些中國基督徒領袖曾努力要將福音培植在中國的土地上，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除了零敲碎打地販賣一些西方傳統神學或近代神學以外，不可能作出什麼重大的成就。這樣的神學不能生根，對中國廣大基層信徒也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它不是建立在中國基督徒的經驗的基礎上。

現在，由於有了三自愛國運動，一個擺脫了西方勢力統治和影響，日益與中國人民認同，並為中國人民能接受的真正的中國教會已經出現了。它處於一個嶄新的歷史社會背景中。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正從事於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基督徒和廣大人民，肩並肩地為着人民共同的事業而奮鬥，同時又認真地試圖把基督教的信仰與使命，和中國人民所經歷的偉大歷史經驗結合起來。我們的教會現在還很小，很年輕。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和困難，但現在我們能夠說，我們已經有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一個走向成熟的教會。儘管從神學的意義上它和西方傳統的教會論所說的那種教會不完全相同，但這是一個忠於基督教信仰，具有活力的成長中的團體。在過去三十年的奮鬥與實踐中，我們在神學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體會。現在我向國外的基督徒朋友們作一點簡單的介紹。

我們的出發點是這樣的一個決擇：我們選擇站到人民一邊，選擇站到我們國家的利益的一邊，選擇站到一個四千多年來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最公正、最人道的新的社會制度的一邊。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遠非盡善盡美。我們有許多該改過之處，還有缺點、錯誤，甚至還有悲劇。人畢竟是要犯錯誤的。但是，對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從歷史上和現實上的意義來說，用萊布尼茲的話，這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再借用他的「神治論」的學說，既然我們基督徒信仰的神，是一位全能、全智、無所不在，既公義又慈愛的神，那麼我們深信，中國人民獲得解放這一歷史事件，確有上帝救贖的旨意在其中。上帝不是中立的。他站在人民一邊，和人民共同奮鬥。在階級社會中，正如福音書中的耶穌所表現那樣，他站在受壓迫，受欺凌的貧苦人民一邊。因此，我們選擇站在人民一邊，就是站在上帝一邊。這就為我們的神學思維展開了一個極其寬廣的前景。

以自然和恩典，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些重要的神學問題為例，傳說神學中的許多對立和矛盾，可以因一種一元論的觀點統一起來。如果釀用傳統神學的詞語，我很贊同聖多馬（阿奎那）的說話，即「恩典不是自然的否定，而是自然的成全」。但是，把恩典看為一種「外加的恩賜」（*donum superadditum*），把宇宙看成由自然與超自然組成的雙層結構，顯然帶着中世紀世界觀的痕跡。相反，如果把宇宙看作一個不斷演進着的連續過程，即創造、進化、救贖、和最終的完成，豈不更簡單而易於理解？在漢語中，宇宙這個詞是無限的空間和時間的意思。上下四方謂之宇，古今往來謂之宙。這個概念，再加上希臘哲學中「紛繁萬變中存在着秩序與諧和」的觀念，和基督教相信上帝為宇宙和歷史的主宰的信仰，那麼，對中國人來說，這種世界觀是不難接受的。至於三位一體的上帝觀，如果拋棄諸如「同質」（*homoousios*），「和子」（*filioque*）等陳腐的詞語、（不管它們對希臘和拉丁教父具有什麼重要意義），三一論的社會涵義，它所表示的群體觀念，也是不難為中國人所理解的。從文化傳統來看，中國

人一向重視社群關係，也是不難為中國人所理解的，以文化傳統來看，中國人一向重視社群關係，不崇尚個人主義。現代西方存在主義思潮在中國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一般說來，中國人重論理，輕玄學；重實踐，避空談；重生今，輕來世，不那麼強調神秘主義。中國有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傳統。可以把群體觀念作為一個接觸點，把中國文化和基督教聯合起來。人的本質只有在群體中，在社會活動中，通過人與人的關係體現出來。也只有通過人的群體才能認識和體驗上帝。上帝在世界的作為，只有通過群體生活才能彰顯出來。因此，我們相信道成肉身，即上帝之子、真道、或宇宙的基督（Cosmic Christ）成為人身，住在人群中間。整個人類成為上帝的殿。整個人類歷史是上帝創造和救贖的大能與計劃的具體表現。這樣，這個教義對中國人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主張一元史觀。歷史是一個統一體。把它分割為世俗歷史和拯救歷史（Heilsgeschichte）完全是人為的，勉強的，難以令人信服。俗與聖並沒有絕對的差別。生活中的每一事件，每一遭遇都是「聖事」（Sacra ment）。同樣，所謂一般啓示和特殊啓示、知和信、律法與福音、進步與上帝的國，等等，都可以聯接起來，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圍繞着神與人這兩個焦點（中心）的構成的橢圓形神學體系，可以改造逐漸形成一個以道成肉身的基督為圓心，以人類社會為圓周的圓形體系。

這種神學觀絲毫沒有取消或沖淡罪的觀念，相反，却能在更現實和深刻的意義上闡明它。對中國基督徒來說，與其把罪看為人在至高全能的上帝面前的過份自信或自足，還不如把它作為在神與人，人與人的關係中對基督的兩大誠命（律法的總綱，可 12:30—31）的背離來得更有說服力。傳統神學中信與不信的對立，已變得不那麼尖銳。追求實現社會正義和群體生活中的最高的善（summum bonum），才是基督徒生活的理想。但人們去追求所期望的至善的努力中，總是充滿着失敗和違逆，保羅所描述的靈肉之爭的痛苦（羅 7:14—24）正是人類精神生活中進退維谷的困境的真實寫照，是人類在走向歷史的極點（Omega Point，借用德日進的晦澀的詞語）的過程中的痛楚的經驗。基督救贖的大能便在於他能使凡相信他的，凡活在他裏面的人們，能以擺脫罪惡的綑綁，得到更豐富的生命。「感謝上帝，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 7:25）

教會問題。中國基督教幸而沒有「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意識這樣的歷史負擔。中國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一個「王國」，將來也不希望建立這樣的王國。我們要培育的，是一種「天國意識」。教會首先是一個Koinonia，一種精神上相互關心的團契，其次才是一個 eccelesia，一個從衆人中被呼召出來的組織。它不是一種制度、機構，或階級分明的統治集團。在教會的團契中，基督的臨在是從人與人的相互關係有可能提高到更高境界而實現更豐富的潛能中體現出來，從相互的關心和交往中實現更高尚的自我意識，因而發展更深刻、和諧的群體關係。教會所肩負的使命不是統治世界，而是像酵母發酵那樣，為上帝的國作見證。在今天中國教會中，宗派主義已成為過去。這顯然更接近新約時代的教會。西普利安所宣稱的「教會以外無拯救」已逐漸被放棄。理想的教會應該把普世萬民都當作同胞兄弟。過去強調以增加教徒人數為佈道的目標，現在我們把重點放在改善教會和人民的關係上，放在提高信徒的信心和生活的質素上。過去那種舉世皆濁、唯我獨清，自以為義的「約拿意識」，逐漸轉變為同情、謙卑、愛心與服務精神。我們主張互相尊重，提倡一種健康的廣涵主義（Latitudinarianism），逐漸平息和消滅過去長期存在着的宗派紛爭，「用愛心互相寬恕，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2—3）至於教會的組織管理制度、聖職、儀禮等問題，我們一向謹慎從事，不想操之過急。現在正在走進各種嘗試或試驗。我們的指導原則是：要具有中國特點，適合中國教會實際情況，互相尊重，求同存異，不強求一律。

對末世論問題，越來越多的信徒對過去傳統的解釋持保留或懷疑態度。我個人倒贊成莫爾曼對「終極論」（eschatology）這一詞在詞源學和語文學上的分析和意見。關於終極問題不存在着什麼既定教義。神學應該是充滿希望向前看。從長遠來說，人類歷史還處在初始階段，何必對終極問題妄加臆測呢？我們只能考慮將來，對將來抱着希望和信心，為將來而奮鬥。上帝創造世界時，「看着這一切都是好的」（創一章）。何必認定這個世界將來要經歷一場大災難，一切都歸毀滅？宣稱在最後審判對一切人的作為和成績都要毀於消滅，這不是福音，也違反上帝創造的宗旨和應許。在創造中人成了上帝的同工。我們神學院過去有一位年長的老師，在末世論問題上，自覺地從千禧年前派轉為千禧年後派，因為他肯定新中國，他不相信這樣的國家、社會、人民即將毀於一旦。他願意看到它在最後審判到來之前，至少還有一千年可以存在下去，繼續發展和進步。他在傳統的千禧年論這個神學框架內改

變他的神學見解，是由於他選擇站到人民和新的社會制度的一邊。此外，還有一些人覺得在未得到新的亮光以前，對這個問題寧願有所勿言，因為他們覺得述說「預言」來反對或貶低上帝所創造的人，不能造就人。

以上這些，不過是我們在神學思考中的一些點滴的見解，還處於初生狀態，很不成熟。每個問題都像「生長邊緣」一樣，將繼續發展，深入。我們寧願如此。在尚未成熟以前就倉猝加以系統化，體系化，對我們這個年輕的教會的蓬勃生機和創造精神只會有害無益。我們提倡「百家爭鳴」。不久前有幾十位背景不同的教會工作者在一起開了一個會，以一些神學問題展開交流，討論，各抒己見。從這次豐富多采的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和大致相近的趨向。保羅、梯立克曾說過，每個時代都應該對神學進行再造。今天中國教會根據我們的經驗和體會，在神學上重新發現和理解上帝對我們人民和全體人類的良善，和祂的恩慈的高深博大。這是一種充滿希望和活力的神學，是在信心的導引之下為追求更和諧、更豐富的群體生活而努力的神學。這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底實，未見之事的確據。」（希 11:1）

我們神學思維的素材，是從《聖經》和教會的實踐經驗而來的。此外，今天中國人民和學術界，通過報刊和廣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議論（所謂「世俗思想」）也是我們的材料。例如關於唯心主義思想在哲學史上的作用和價值、人生的意義、「心靈美」的道德含義、和宗教的性質與社會作用等等問題的討論，都對我們有所啟發。西方某些現代神學著作也有參考價值。你們可能已覺察到我在上面所說的，有某些方面和解放神學頗有近似之處。應該指出，中國教會和拉丁美洲教會的一些思想家，都同樣經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歷史階段，我們的觀點也同樣是以歷史實踐和人民立場出發。因此在神學思想上有些相近，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雖然是不同戰線上的戰友，但拉丁美洲的朋友們把神學作為在社會鬥爭和政治鬥爭中爭取解放的思想武器，而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基督徒在內，已經在三十年前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們的神學不是像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所理解的那樣，以解放為目的。我們以為神學的任務應該是和解，是言歸於好——是使從前曾和人民離異的基督徒再度與廣大中國人民認同與和解，（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向人民見證福音），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背離了上帝的人，通過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整個人類綿長的歷史過程中，重新回歸上帝，與慈愛的天父上帝和解。

某些西方現代神學家的立論和主張，我以為是會受到中國基督徒理解和歡迎的。不過我們只是在較近幾年才更多地接觸到他們的著作。因此，我雖然冒昧地向你們簡單介紹我們一些點滴的神學見解，但應該說，我們還要更多地向你們學習，尤其是向那些站在人的一邊的神學家學習。所謂「站在人的一邊」，我指的是站在人民一邊。這個「人」具有更具體的歷史與社會的含義，而不是泛指哲學上抽象的人性。 謝謝你們。



中國代表團中的三位主教：（由左至右）
唐鉅山、丁光訓、涂世華在大會上發言